

● 书 评

颇有奥义

*——评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

茅家琦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3)

[作者简介] 茅家琦(1927-), 男, 江苏镇江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 313.4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4-0510-02

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教授的专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体 862 年的中国观察》。作者在日本讲学期间, 查阅丰富的藏书系统, 研究“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这一颇有价值的课题。这本专著是这部丛书的第二本。

在国内系统介绍并研究这方面的文献还是第一次。

19世纪60年代初期, 上海已成为英、法、美侵略中国最重要的据点, 上海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太平军也于这时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1862年4月初, 李鸿章从安徽到达上海, 随即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 他指挥的湘、淮军也陆续到达。在上海的清军、常胜军以及黄、法陆海军联成一体, 由英国军官士迪佛立统一指挥。英法侵略军与清政府勾结共同防卫上海地区, 干涉中国革命已成定局。5月17日, 李秀成率领大军在太仓打破清营30余座, 击毙知府李庆琛, 攻克嘉定。学者们将研究视线集中在英法与清王朝的关系以及共同打击太平军问题上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 1862年日本幕府派遣使团乘幕府官船“千岁丸”赴沪, 在上海逗留两个月一事, 长期以来就被忽视了。

冯著是根据使团成员撰写的各种“见闻录”写成的, 它对使团在上海的活动、所见所闻、思想动态做了多方面的论述, 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1862年“千岁丸”上海之行的性质、任务是什么?《冯著》判明: 它是1854年日美签订《神奈川条约》, 日本被迫开放, “锁国体制”崩溃, 追求现代化思想发展的结果。冯著说: “在被迫开放门户以后, 日本‘开国’的力度和主动性, 明显高于中国”(冯著第15-16页); “幕府以重金购买英船, 作为贸易官船出使上海, 其直接任务自然是开展对清商贸”, 但是, “具体的货品交易尚在其次, 借此作广泛的商事及社情调查更为要紧”。冯著说: 这是因为, “其一, 上海是西洋人在远东最重要的商业、交通、军事据点”, 日本“把上海视作西方各国在远东的支店和窗口, 当然希望到这个近水楼台来观摩西洋文明。”其二, “日本民间把太平天国与大盐暴动联系起来……幕府此际遣使到清朝与太平军作战前线的上海, 当然有实地观察太平战事的意图。”其三, “具体考察日清贸易诸细节, 以及清朝与西洋人商贸关系诸问题。”(冯著第49-51页)

可见, “千岁丸”上海之行就是日本方面了解世界, 寻求改革, 走向现代化的一项具体行动。冯著以使团人员撰写的各种见闻录验证了上述观点, 冯著写道:

“翻阅上述见闻录, 少有风花雪月的咏叹, 多有对上海社会实态的记述与思考, 从中可以看见年轻的下层武士们(年龄最小的纳富18岁, 较大的中牟田25岁、五代27岁, 居中的高杉、日比野23岁左右)席不暇暖、左右采获的身影, 显示了近代日本人求知于世界的维新趋向和富国强兵的炽烈追求。”(冯著第61页)

1862年“千岁丸”上海之行, 的确又推动了日本改革维新思潮的发展。冯著写道:

“曾是日本‘文化母国’的近邻中国的沉沦, 给日本人敲响了警钟, 他们获得的共识是——不能重蹈中国的覆辙, 必须改弦更弦。……幕末日本的社会思潮, 呈现过‘锁国佐幕’、‘锁国倒幕’、‘开国佐幕’、‘开国倒幕’等

几种形态,总趋向是由‘锁国’到‘开国’,由‘佐幕’到‘倒幕’,而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来自清国的教训也是其中之一,‘千岁丸’上海行直接观察所获得的‘开国不可缓’、‘改革弊政不可缓’一类感想,又尤为真切。当其反馈回日本,自然会发生相当影响。”(冯著第80页)

冯著以各种“见闻录”为依据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一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日本“开国”奉行的路线问题。

日本的幕末维新和明治维新采取拥戴天皇的自上而下井然有序的实行社会改革。冯著指出:1862年“千岁丸”上海行以后形成的“太平天国否定观”,即对于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恐惧,“也在这种抉择中起了点化作用”。冯著写道:

“日本藩士的见闻所及,无不在清方氛围之内,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印象是:暴虐无理,杀人无数,破坏社会生产力,摧残传统文化,导致外国势力入侵,等等。……他们在上海对太平战事的观察和体验,集中到一点,便是认为农民战争必将导致内乱,并加剧西洋人入侵造成的外乱,使得国将不国。”(冯著第184—185页)

冯著明确写道:

“从高杉、中牟田、久坂等人的言论可以清楚看出,发生在西邻中国的太平战事,给日本维新志士的教训是:力避下层民众暴动,以杜绝社会动乱,尤其是谨防内乱外患并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新志士……走上一条依靠天皇权威、自上而下、有秩序的变革路线。应当说,访沪藩士进一步强化的‘太平天国否定论’,对于这一路线的择定是起作用的。”(冯著第87页)

冯著就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日本“开国”路线形成之间的关联,作出如上判断是极富新意的。我个人赞成他们论断。

冯著写的另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关于被迫开埠以后上海地区的道德沉沦。

访沪日本人士,对上海开埠以后的繁荣景致作了大量笔记。他们惊叹:日本的大阪远远比不上上海的繁华。同时各种“见闻录”也大量记载了当时上海官员的腐朽、社会道德的败坏。

日本使团访问了上海道台。冯著写道:从使团成员记述中,“可以得见,处在兵荒马乱之际的上海道台府,礼炮、仪仗等官厅派头虽然还保持着,但内在的货色已经贫乏得可以,连在道台大人眼皮底下,招待外宾的场合也秩序混乱、内外无别,而且仆从们竟当着外宾之面小偷小摸,大失国格。这一切都显示着清朝官府权威的跌落。”(冯著第119页)

上海开埠以后,社会风气日益衰败。“千岁丸”访沪成员看到的是:秦楼楚馆,竞相开办;毒、赌、娼已成为上海的“三大毒瘤”。他们接触到的社会人士给他们的印象是贪利、庸俗、无耻。冯著中择引了下列几件事:

“日比野宽记曰,他们乘船在黄浦江上,有人‘把烟袋掉进水里,舢舨过来捞起来就拿走了,实在可恨’。另一次日比野由一中国人引导寻路,日比野口渴,想吃桃子,引路者要日比野给五十文钱,买来桃子后,那人见日比野钱给得爽快,马上改口要一百文钱。日比野大骂此人奸商狡猾、贪婪。投桃而去。日比野将这种刁滑作风归结为‘海港边人的贪婪,是洋夷风俗的结果。’”

冯著还转述高杉晋作与一位中国士人的笔谈记录,说明中国士人也哀叹上海风俗之败坏:

高杉晋作问:“弟要问上海之隐士逸民,请兄为语其名。”

中国士人答:“此地海滨之地,俗人多而隐逸者无,不敢具名。惟钱是欲,圣道凌夷,可慨叹矣。”

高杉晋作说:“是极,是极。惟钱是命,廉耻不息,可笑可叹。”(冯著第227—228页)

冯著写的这两个问题,就问题本身看,正如冯天瑜教授在“后记”中所说,“内容皆无奥义”。但是,如果考虑到访问团成员是在1862年提出这两个问题,联系到此后140年的风云变幻,学者们不能不产生如下思考:从中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中日双方各不相同,中国方面,志士仁人热中于做“洪秀全第二”,日本方面却从“太平天国否定论”中得到启示形成另一条“开国路线”。这条路线,虽然存在弊端,日本国的现代化走过的道路也曲折坎坷,但是取得的成就则是显著的:如何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评价这一条路线,从而吸取有益的东西,仍然值得学者研究。学者们也不能不产生如下思考:文明古国,礼义之邦,打开国门,一下子就变成如此贪利、庸俗、无耻,从100年的历史看,“经济发展、道德落后”,似乎是落后地区推动现代化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应如何认识并预防或治理这种现象?人们阅读冯著,对上述两个问题会得到若干启示,但问题的答案必将是多种多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冯著提出的内容,并不是“皆无奥义”,而是“颇有奥义”。